

刻石湖星慶筆

漢州石記
曰者託宿秘篆寄款神慮供奇計平注而通其
購坤極微金羽錄三堂河漢未際其源今昔
究此山郭不在江墳薄人察騰物外必有特起
田砥平錦澄辟立壁九洞六廷寒中堂或位形
勢八千變休席奔象浮梁抗柱激奔流而奔浪
而平岑塔崇飛動逼人此接驚龍客從微而三
善而一慶天時實乳練於三類石牀列次仙座
集行健輝兮察寸恍于惚于使營坻九昇瞻恐
習冀志若摩雪天秦漢之間莫知越祀篆皇尤
昔是時也篆名者孰雌而退徇物滑守心而安
而凝懷書者恒古而默有若郭伯舉心守恭慶
觀國政門尤迹談者不容於世義心厚行遠者
能負傾其方人樂其業流允昭心介
舉斯一歌一詠以邀以進莫不解如
龍遠去馬豈非避暑窟佳師也
轉開寶擬篆之迹亦亦之

肇庆星湖石刻

何鲁麓

肇庆星湖石刻

ZHAOQINGXINGHUSHIK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肇庆星湖石刻/《肇庆星湖石刻》编委会编.

北京: 红旗出版社, 2005.9

ISBN 7-5051-1287-2

I. 肇…

II. 肇…

III. 石刻—汇编—肇庆市

IV. K87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12045号

肇庆星湖石刻

《肇庆星湖石刻》编委会编

责任编辑: 黄苇町

封面设计: 松永生

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 100727 地址: 北京市沙滩北街2号

E-mail: hqcbs@publica.bj.cninfo.net

编辑部: 64037153 发行部: 64037154

印刷: 佛山市华彩印刷有限公司

2005年9月北京第1版 2005年9月广东第1次印刷

开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张: 25.25 字数: 290千字

ISBN 7-5051-1287-2

定价: 168.00元

【肇庆星湖石刻编委会】

【主 编:】 刘伟铿 顾作义 孙 德

【编 委:】 邓达礼 肖又喜 叶峥嵘

成洪波 邱国祥 李 玮

徐东海

【封面题字:】 何鲁丽

肇庆星湖石刻
ZHAOQINGXINGHUSHIKE

序言

XUYAN

林雄

星湖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山奇水秀，风光迷人。七星岩峰险、石异、洞奇、庙古，被誉为“人间北斗星”、“岭南第一奇观”；鼎湖山群峰拥翠、浓荫蔽日、飞瀑流泉，被誉为华南生物物种的“基因储存库”、“北回归线上的绿洲”。除了优美的自然景观外，还有底蕴深厚、内涵丰富、鲜为人知的人文景观。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大放异彩，使星湖更加美丽神奇。

星湖摩崖石刻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星湖摩崖石刻记述了肇庆的地理环境、山河变迁、历史大事、宗教信仰、庙宇建筑、岩石水土以及朝代更迭。譬如，“道光甲辰水痕至此”，说的就是道光24年（1844年）肇庆堤围全被冲决，洪水漫淹到这个位置，这是肇庆历史上的一个最高水位记录。星湖摩崖石刻，是书写在石头上的真实历史，是一轴反映肇庆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军事、水文等内容的壮丽长卷。

星湖摩崖石刻是一座开放式的文学宝库。石刻中诗、词、曲、赋达217幅，游记、散文、题记体裁多样，瑰丽多姿，琳琅满目。唐代著名文学家李邕的《端州石室记》，现代伟人叶剑英元帅的“借得西湖水一圆，更移阳朔七堆山，堤边添上丝丝柳，画幅长留天地间”，把端州的山水、星湖的景色写得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充满诗情画意，脍炙人口，感人至深。正如陈毅同志题写的《七星岩》诗所说的：“石室叹钻天，景福秘地藏，壁上题词句，千年成诗廊”。自唐代开始，历代文人雅士都在七星岩留下了珍贵的墨迹。唐代宰相李绅；宋代名臣、端州知州包拯，苏轼好友、端州知州郭祥正，理学开山祖周惇颐，状元黄公度；明代“后七子”之一吴国伦，抗倭名将俞大猷、陈璘；郑成功父亲郑芝龙，名士郭都贤，忠烈陈子壮；清代大文人袁梓贵、黎简等，当代伟人朱德、叶剑英、陈毅等，都在星湖留下了诗文或题赋。星湖摩崖石刻是名副其实的“千年诗廊”、文学宝库。

星湖摩崖石刻是我国书法艺术的瑰宝。星湖石刻包纳了篆、隶、真、行、草各种书法，可以说是一部中国的书法简史和书法艺术的诗博物馆，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品和天然的书法展览。星湖有许多书法史上的名碑，唐代李邕的《端州石室记》正书碑，明代吴桂芳的篆书，明代朱完以隶书笔意写篆书的“帝觞百神之所”，清代黎简的四言诗，陈恭尹在玉屏岩用隶书刻下的大字题记，状元林召棠的正楷，黄培芳的行书，耆英的草书石刻等等，都是石刻中的书法艺术珍品，笔力沉雄，刚劲有力，自成一体，潇洒奔放，对后世影响较大，属国内石刻中罕见的瑰宝。

星湖摩崖石刻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石刻开创了书法家在名山大川镌刻纪功文字的先例。它较之在青铜器上铸刻，方便、节约，而且其空间回旋余地很大。特别是在没有墨迹供欣赏的情况下，通过“刀锋”看“笔锋”，体现了历史上刻石工人的创举。从手书到刻石在艺术上是一种再创造，经过刻石书法的魅力更丰富了，增添了一种金石味，字的立体感加强了，显得更为厚重，由于石质坚实，也得以长期保存。同时石刻至真至情，大风大雅，表达了作者的真实感情和广阔胸怀。朱德同志的《游七星岩》一诗：“开心才见胆，破腹任人钻，腹中天地阔，常有渡人船。”正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宽怀大度，高风亮节的真实写照，给人以无穷的鼓舞和力量。

我们要象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星湖摩崖石刻，保护前人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崇高责任。同时，要深入挖掘、研究摩崖石刻，开发和利用这些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星湖风景名胜区的文化内涵，丰富肇庆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

刘伟铿同志在认真研究摩崖石刻的基础上，对1986年前的星湖摩崖石刻全部抄录，整理并拓片、注释，编辑出版《星湖摩崖石刻》。这为后人研究摩崖石刻提供了重要资料，为导游学习提供了辅导材料，为广大游客认识星湖，了解肇庆提供了一本文化品位较高的好读物。

（作者是中共肇庆市委书记、肇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1、本书分七星岩石刻和鼎湖山石刻两部分。其中七星岩分为石室岩外洞口壁、石室岩洞内东壁、石室岩洞内西壁、黑岩壁、石鼓壁、石鼓壁对壁、璇玑台左壁、台对壁、石室岩洞内西岩壁、石室岩外壁登山路壁、玉屏岩北路、玉屏岩南路、阆风岩、石峒、天柱岩、阿坡岩、蟾蜍岩、仙掌岩20个区。鼎湖山分为庆云寺、和尚碑、庆云寺路、飞水潭、云溪5个区，每刻各加编号。

2、每一石刻均定一名目，按诗、文、题字、题名、题额等分类。

3、每一石刻分列：石刻编号、名目、年代（朝代年分及公元年号）、规格（面积、字体）、原文。有的附有备注，就作者的生平、时代背景、沿革考证等略加介绍，对个别词语略加注释。部分还附有点评，就石刻的思想、艺术、历史研究等文物价值略加推介。

4、石刻原文的繁体字、异体字，改用简化汉字和规范字。但现仍存在的本字、假借字照旧，如“蚤莫”不改为“早暮”。现已残损的字，能参考其他材料补出的，用方括号补出，如“一歌一[咏]”。如无法查补的，用□表示缺字；如无法知道残缺字数的，用□……□表示。原刻印章中的文字，在印文后加“（印）”字注明。有个别草字、古体字虽然字迹清楚，但校者无法辨认录出的，用△表示。个别字后人填红时误填者，参考史书订正，不将误字录出，故个别字与照片有出入。

5、石刻文种繁多，本书对石刻中的题榜、题名、标题、内文、签署、年月等，均视同“原文”看待，加以标点，在排印格式上不作区分，读者自可辨之。

6、有少量金刻一并收录。

7、本书删去今已残缺或未能拍到照片的石刻，另附录石刻年代索引，以备查检。

CON



TENTS

肇庆星湖石刻概述

七星岩石刻

- 一、 石室岩外洞口壁 (A1—36)
- 二、 石室岩洞内东壁 (B1—28)
- 三、 石室岩洞内西壁 (C1—16)
- 四、 黑岩壁 (D1)
- 五、 石鼓壁 (E1—17)
- 六、 石鼓壁对壁 (F1—20)
- 七、 璇玑台左壁 (G1—52)
- 八、 璇玑台壁 (H1—11)
- 九、 璇玑台对壁 (I1—18)
- 十、 璇玑台右壁 (J1—11)
- 十一、 石室岩西岩壁 (K1—8)
- 十二、 石室岩外登山路壁 (L1—18)
- 十三、 玉屏岩北路 (M1—24)
- 十四、 玉屏岩南路 (N1—42)
- 十五、 阆风岩 (O1—13)
- 十六、 石峒 (P1—23)
- 十七、 天柱岩 (Q1—6)
- 十八、 阿坡岩 (R1—6)
- 十九、 蟾蜍岩 (S1)
- 二十、 仙掌岩 (T1—2)

鼎湖山石刻

- | | |
|---------|---------|
| 一、 庆云寺 | (U1—17) |
| 二、 和尚碑 | (V1—3) |
| 三、 庆云寺路 | (W1—16) |
| 四、 飞水潭 | (X1—20) |
| 五、 云溪 | (Y1) |

附录一、石刻年代索引

附录二、石室岩摩崖石刻分区示意图

后记

肇庆星湖石刻概述

肇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肇庆星湖是1982年国务院审定的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包括七星岩、鼎湖山两部分。

肇庆星湖不仅风景资源丰富，而且人文景观众多，其中石刻是远近闻名的文物古迹之一，七星岩摩崖石刻2001年还被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刻中，各种文体齐全，数目比较多，地点比较集中，面貌比较完整，受到历代金石研究者的重视，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历史价值、文学和书法艺术价值，以及科学研究价值。

正如陈毅同志1966年题写的《七星岩》五言诗（A10）所说：“石室叹钻天，景福秘地藏，壁上题词句，千年成诗廊。”石室岩石刻以至全部星湖石刻，诗占了很大一部分，的确可称“千年诗廊”。至1986年止的七星岩石刻504则，当中诗占了180首；鼎湖山石刻150则中，光宋广业《咏梅》就有百首。这些诗刻，饱含历代诗人对祖国山河草木的一片深情，是进行传统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当中朱德《游七星岩》（A9）一诗云：“七星降人间，仙姿实可攀。久居高要地，仍是发冲冠。开心才见胆，破腹任人钻。腹中天地阔，常有渡人船。”向人们展示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豁达的胸怀。叶剑英“借得西湖水一圈，更移阳朔七堆山。堤边添上丝丝柳，画幅长留天地间。”（K2）一诗，更是对党领导下人民群众改天换地英雄气概的热情讴歌。

古代石刻的思想内涵是历史风云在古人头脑中的反映。星湖石刻年代最早者在唐代，通过对石刻作者生平和他们来肇遗闻的追溯，既可以对唐宋两代肇庆的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元代民族压迫的深重，明代由两广总督主导的改土归流政策，对澳门实施的主权管治，明清两代西江佛教与儒学的兴衰以至民国时反袁护国军务院在肇庆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课题的研究，提供历史的佐证；还可以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探寻石刻诗文中透露的思想文化轨迹，汲取其中的思想精华。

唐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星湖最早的唐刻“正法眼藏，涅槃妙心”

（Y1）表达了世界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体系最早奠基人惠能和尚的弟子，智常禅师对佛教禅学最高境界的概括。他主张通过对佛教正法的修习，达到对人间生死诸苦及其烦恼根源最彻底的断灭。而盛唐时期的文章家李邕所写下的《端州石室记》（A1），则从儒家带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入世”观出发，指斥仙境的虚妄，主张人们珍惜人间实有的美景。他赞扬端州地方官毕刺史按照儒家治理天下的主张，“广孝闻家，至忠观国，……故能吏修其方，人乐其业”，达致天下太平，能够有机会与友僚在星岩美景中尽情享受人间乐趣。他认为，这种乐趣是佛道鼓吹的“转丹灶，掇紫芝，迹参寂之远心，惟习隐之幽致者”所追求的虚幻境界不可比拟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盛唐思想界争鸣的活跃场景。

唐代端州仍是“蛮荒之地”，西江经肇庆分两条河道出海。一条从七星岩前过，李邕《端州石室记》说石室岩“介在江坟”，可证。南海风涛壮，西江瘴疠多，中原士人视岭南为可怖之地。沈佺期、宋之问等达官贵人被贬，不带家属，沿途留下凄惨的诗篇。但唐敬宗时因得罪奸相李逢吉被贬为端州司马的李绅却在石室岩留下了不同凡响的石刻遗迹：“李绅，长庆四年二月，自户部侍郎贬官至此。宝历元年二月十四人将家累游。”（B22）他令家属搬到端州来，与他一起畅游七星岩。传说他的著名诗篇《悯农二首》就是在端州时写下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据《肇庆府志》载，李在端州，“自检益严”，很有善政，端州人为之感泣。公余之暇，以诗自娱。后来唐敬宗终于发现李绅是被冤枉的，招回朝，任为江州长史，武宗时任为宰相。临调走时，端州人留其衣带，立祠纪念。

李绅是唐代被贬西江的15位宰相级人物当中的一位。唐代众多中原优秀人士到达西江流域各州，传播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文化，为端、康、封等州的开发作出了贡献。至晚唐时，西江北边河道淤浅，耕地与湖泊增加，西江遂由南北两河道出海的双羊峡变为零羊峡（今羚羊峡）。唐宝历元年王化清所书

《游石室新记》(C7)云:“(七星岩)东西倚山之阳二十余里,西通于上武林,东抵于零羊峡。”它为我们留下了这一山川变异的印记。

北宋初,石室岩游人渐多,附近开始有了居民,景祐三年(1036年)诗人杨备有诗(B12)可证。其时端州开始从一个狭小的军事城堡,向一个以定居式农耕经济和广府汉文化为中心的港口城市转变。包拯在其中起着筚路蓝缕的作用。正是包拯,首开后沥水,把北边旧河道上的西江余沥排变一部分,首把端州衙西迁至今宋城位置,为后继者开发出以山、湖、城、河依次排列的宋城打下了基础。庆历二年(1042年)包拯任端州知州即将届满时,广南东道派提点刑狱周湛,同提点刑狱(提点刑狱副职)钱聿,到端州考察包拯政绩。包拯与两个上级官员同游七星岩,留下了题名石刻(B17)。肇庆学院陈大同教授认为,同提点刑狱钱聿是武官,提点刑狱周湛在巡行各州及其籍属邓州周围的名胜,均未见有他的题名,显见两人在星岩题字的可能性不大。从用语措词和书法行款来看,题名风格与包拯生性“峭直”、“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以悦人”相符,故该题名石刻是包拯亲笔书写的真迹。元明之间陶宗仪所编《书史会要》把包拯列为宋朝书法高手之一,七星岩包拯之题名石刻至今清晰如初,弥足珍贵。

北宋庆历初(1041年)到元丰末(1085年),朝廷相继有欧阳修支持的新政与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施行。当中皇佑二年(1050年),与不同政见的欧阳修、王安石俱有诗文交往的丁宝臣任端州知州,邀苏州著名学者王逢游七星岩,留有题名石刻。另外,以“祖龙学”闻名一时,庆历四年(1044年)始任广东转运判官,皇祐年间升至转运使的祖无择也在皇佑二年留下石刻(D1)。其后,祖无择历官直集贤院学士,首倡封孔子后人为衍圣公。熙宁初(1068年)知通进银台司,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贬忠正军节度副使。上述石刻反映了北宋初不同程度参与新政与变法等政治风云的知名学者曾到岭南传播中原文化。

丁宝臣祖无择皇祐二年在端州遇到的政治风云,还有广西壮族首领侬智高于此前一年在广源州(今越南高平省)起兵反宋。身为行政首长,丁祖两人当然要谋划防守之策。但两人俱非将才,皇祐四年(1052年)五月,侬智高攻陷横、贵、龚、藤、梧、封、康州,端州因未有城墙防守,丁宝臣弃城而逃。侬智高占领端州,直趋广州。朝廷免去丁宝臣知端州之职,以江柬之代之。祖无择亦离职,以孙沔为广东转运使,陶翼为副使。是年冬,侬智高败走,江柬之邀丁宝臣同游七星岩,有石刻。江柬之自此始筑端州土城墙。次年,陶翼与江柬之、丁宝臣再游石室,刻下长篇游记。(C8)

经过政治风云的洗礼,北宋皇朝逐渐探索出较为完善的封建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诞生了以周惇颐为开山祖的理学。理学强调天人和合,以天理治人心。周惇颐熙宁元年(1068年)任广东转运判官,熙宁四年(1071年)任提点刑狱,广东多处名胜留下他的题名石刻。石室岩东壁的周惇颐题名石刻(B25)是他初到广东留下的。故老相传,周惇颐在端州从三月呆到七月沥湖荷花盛开时,写下了赞美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著名散文《爱莲说》。

在石室岩留下石刻的北宋著名文人还有与苏轼交情甚深的郭祥正。郭少年时便有诗名,诗人梅尧臣称赞他是李白再世。但他中进士以后仕途不顺利。魏泰《东轩笔录》卷六载他熙宁年间知邵州武冈县,拥护王安石变法,上书皇帝,“乞以天下之计专听王安石区划,凡议论有异于安石者,虽大吏亦当屏黜。表辞亦甚辨畅,上览而异之……出其章以示荆公(安石),荆公耻为小人所荐,因极口陈其不可用而止。是时祥正方从章惇(王安石悦其才,用为编修三司条例官)辟,以军功迁为殿中丞。及闻荆公上前之语,遂以本官致仕。”哲宗立,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废王安石之法,起祥正通判汀州。元祐三年(1088年)升任端州知州。他兴致勃勃与高要县令同游石室,刻下题名石刻(B11)。但次年,他发觉旧党一意废除新法,为了争夺权力还分裂成朔、蜀、洛三党。他愤而上书皇帝乞骸骨(请求退休回家),“作《石室游》一首,刻之崖间”(B10)。该首赋,气势磅礴。借写石室之奇景,暗喻官场的变幻莫测,透露出怀才不遇的悲愤,书法亦甚佳。

哲宗绍圣三年(1096年)三月辛亥,帝封弟赵佖为端王,食邑端州。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哲宗死,端王赵佖登帝位为徽宗。是年十月乙卯,升端州为兴庆军节度(升屏藩为节镇)。潮阳令郑敦义上书陈时政,诏进一阶,被任为兴庆军节度使。次年(1101年)夏末到端州上任,再次年(1102年)暮春游七星岩写下题名石刻(B6)。但直至崇宁四年(1105年)仍有端州知军州事一职存在。政和三年(1113年)改兴庆军为兴庆府,帝拨出专款,令郑敦义始筑端州石城。政和七年(1117年)暮春,程乡(今河源)人古革接任兴庆府知府。是年夏,与同知冯齐荀有请于朝。“次年春,乃被旨升作大藩。”八月二十日,在石室岩刻下题字(B5)。而据《宋会要》,该年(1118年)十月二十一日,因广东转运判官燕瑛奏请,改兴庆府为肇庆府,皇帝“亲洒宸翰”,为肇庆府题字。其后,守臣(古革)将徽宗的题字筑御书台于府前供奉。B5、B6为我们考证这一段重要历史提供了实物佐证。

南宋绍兴八年状元黄公度因反对秦桧投降卖国,

于绍兴二十四年被贬肇庆府通判。他在石室岩刻下七言诗(B28)云:“欲访仙子问真诀,岩岫寂寂水泠泠。”表达他在封建专制下难找到人间真理的傍徨。南宋诗人赵廛则在(C15)长诗中,借驳斥有人认为七星岩“曾不如丘陵”之见,愤怒地指斥歪曲真理的人“海上有逐臭,宁云尔德馨。主人何负盗,势固为盗憎”。主张“霹雳行雷霆,驱逐百种怪”。认为“男儿须辩此,谁能作蝇营”,不可与歪曲真理的人蝇营苟苟。

元代民族压迫深重。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弟弟文壁以惠州城降元,被任为临江路(治今江西清江县)总管,至元二十五年(1289年)任广东道宣慰同知,其后他愤而辞官,偕母及家眷隐居四会。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游七星岩,留下诗刻(I9):“池上飞仙骑北斗,山间过客操南风。深陵高谷知何限,独立斜阳哭路穷。”池中之龟鳖升仙骑在北斗头上,只有山间过客坚守虞舜之德(相传虞舜作五弦琴,歌南风),对于山陵陷落谷地升腾的沧桑巨变,诗人独立斜阳下为末路穷途而痛哭。

明代大一统使国力渐趋强盛,对外贸实施有限开放和对少数民族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成为岭南当局之要务。洪武七年(1374年),宰相汪广洋被贬到肇庆购买云贵及罗定一带所产马匹和番马(西洋马),(C14、B8)均记其事。此可补充《明史·食货志》关于在河西走廊设茶马司买番马的记载,说明明廷开放河西茶马贸易的同时也在广东有此外贸。

改土归流政策引起少数民族上层的反抗。成化元年(1465年)金都御史韩雍与太监总镇陈瑄在梧州筹设两广总督府,镇压少数民族的反抗。成化三年(1467年)韩雍升任两广总督,在肇庆设总督行署。次年游七星岩,留下五言诗石刻:“丈夫感知遇,图报心孔切。所愧才德荒,弗能继前哲。”表达了他光考虑报效封建朝廷却欠下少数民族大笔血债感到良心有亏的矛盾心情。成化十年(1474年),韩雍因师老无功被撤职。次年,以朱英为两广总督,调江西副使闵珪为广东副使。与韩雍一味主张对少数民族实行军事镇压不同,闵珪主张剿抚并用。成化十四年(1478年),他在七星岩留下诗刻(I16):“肯凭女媧手,炼补苍天缺。”弘治四年三月,闵珪升任两广总督,次年,朝廷因闵珪奏,诏“两广等处,近年有未获匪徒逃避山泽者,许其自首,悉免其罪。有司仍加抚恤,俾安生理。”闵珪在广东为官二十年,弘治七年(1494年)十一月升南京刑部尚书,以量刑慎重著称。

明代大量瑶壮族人融合到汉人中去,汉族广府文化全面确立。广府学术文化吸收了以江西吴与弼为代表的儒家心学,发展出以陈献章为代表的岭南学派。

陈献章弘治七年(1494年)应肇庆知府黄琥之邀游肇庆,写下《肇庆城隍庙记》(L17)。文章认为神权与政权的作用有“相消长盛衰之理”,其目的都在“致一郡之和”,使人心与天地之心相通。它反映了岭南学派对民间神权信仰与社会政权稳定之间关系的一种见解。

正德三年(1508年),两广总督陈金接纳岭西分巡道吴廷举的建议,开放广东沿海多个舶市,发展与东南亚的对外贸易。正德六年(1511年)汪鋐接任岭西分巡道驻肇庆。汪鋐是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正德八年(1513年)游七星岩留下踌躇满志的诗刻(G34):“骢骑联行出郭游,星岩直上最高头。荷香竞逐熏风至,岚气都从午日收。谁向尘寰开此境,天将佳赏付吾流。”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天地为年轻人展现出美好的前景。正德十二年(1517年),汪鋐升任海道副使,负责海防安全。八月十五日,葡萄牙人安德拉和皮莱斯率船八艘进入屯门(今属香港),以炮威胁守将,要求上岸贸易,被拒绝。九月,舰队突入广州鸣炮示威。两广总督陈金令汪鋐传唤安德拉至广州光孝寺,习礼报朝廷处置。正德十六年(1521年),由于葡人在海边靠非法贸易和海盗行径为生,诏逐葡人出境。两广总督张崧命海道副使汪鋐发起屯门之役。汪鋐指挥肇庆水师营查民出身的水兵潜入水底,凿破洋船,俘获皮莱斯等人,缴获西洋大炮。嘉靖元年(1522年)汪鋐升任兵部尚书,成为中国历史上仿造西洋大炮第一人。

经过屯门之役的较量,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开始以尊重中国主权的方式与分巡海道副使汪柏谈判,得以在遵守中国官方管治的前提下进入蚝镜澳(今澳门)口岸贸易。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两广总督张臬批准接受中国法律管束的葡人按唐宋蕃坊自治旧例,选出“番长”。秋,葡人公选佩雷拉(Digo Pereira)为行政长,呈报张臬批准。张臬非常高兴,在七星岩刻下“七星岩高如巨叟,岩里有天光皎皎。探奇时复来高人,喜见泰山仍北斗。”(F9)以七星岩的高峻明亮,比喻祖国仍如泰山北斗,不容外人小看。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广东总兵俞大猷与福建总兵戚继光大败倭寇于福建平海卫。次年,潮州拓林澳以喇撻夫总管为首的回族水兵因缺粮饷发起叛乱。驻澳“番长”佩雷拉主动请缨派兵300人协助俞大猷带领肇庆水师官兵平叛,事后,为答谢葡兵,俞大猷答允“免抽分(抽税)一年”,并亲自到澳念葡人有微劳,准许葡人在澳门修建圣保禄公学和圣母小教堂。俞大猷该年在莲花洞壁刻上“天不生奇石,谁擎万古天”的豪迈诗篇(J3),吴桂芳在壁前大石刻上“璇玑台”三个大字(H7)。

隆庆元年(1567年),两广总督张瀚奏请加编民壮三百名于香山守御千户所以御番夷,并请朝廷开放漳州海澄月港,取消海禁,准中国商人赴“东西二洋”贩运。次年(1568年)春,朝廷准张瀚所奏。张瀚与广东巡抚熊桴,邀约福建漳州知府,时刚升任广东右参政的桂嘉孝同游七星岩,三人满怀高兴刻下长篇诗刻(G28, G29)。

隆庆三年(1569年)熊桴还邀请了在文学史上称为“后七子”之一的江西兴国人吴国伦游七星岩。吴国伦也在七星岩刻有长篇诗刻(F20)。该诗古意十足,是当时文学复古运动的一篇代表作。诗末言“天造名山自古今,我辈那能终碌碌。”意谓天尚且造出名山,我们怎能无所作为?表达了作者虽醉心山水,仍不忘报效祖国。这在山水诗中,殊不多见。

万历八年(1580年),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王泮任肇庆知府。他倡修鼎湖白云寺,主持开辟星岩二十景,开挖跃龙渠导沥水由石顶岗(今崇禧塔处)泄潦入西江,减少内涝威胁,建崇禧塔于其上以镇水口。万历十一年(1583年)他还说服新任两广总督郭应聘接受西洋教士入居肇庆,并派人通知澳门方面,使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得以随同传教士罗明坚于九月十日入居肇庆。利玛窦入居肇庆六年,对沟通中西文化作出重要贡献,被誉为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王泮积极支持利玛窦在肇庆传播西方科技文化,还出资为利玛窦刊行《山海輿地令图》,这是历史上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王泮因此被誉为中国放眼看世界第一人。他在阅风岩下含珠洞、蛟龙窟有题字刻石(07, 010)。

万历十七年(1589年),时任南直隶狼山副总兵的东安(今云浮)人陈璘在石室岩登山路旁上刻有题字(L11)。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陈璘率广东水师援朝抗倭。次年,大败倭寇于釜山,是中国海军出国作战取得辉煌胜利的第一次,扬国威于海外。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福建长泰人戴耀到肇庆任两广总督。此人文化上颇有建树。他在任内完成前任总督陈大科始修的万历《广东通志》并付印出版。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他还把万历二十三年被流放雷州的著名僧人、被称为复兴禅宗三大老之一的憨山德清林寺,戴耀复送之往韶州。

戴耀还与巡按御史李时华以及岭南分守道、分巡道等所属官员共同聘请当时著名学者刘克平、朱完、苏景熙、区怀瑞同修《石室志》,并遍丈山塘,划定七星岩景区范围,树立东、南、西、北四界石,“登之志,以杜后之为暴者”,刻石纪其事(A33)。戴耀还在题记之旁刻上“泽梁无禁,岩石勿伐”八个大字(A34),强调对七星岩景区的保护。著名学者、书法家朱完再其旁刻上“帝觞百神之所”几个大字(A3

5),留下石室岩一个重要神话传说。戴耀再在石室岩洞口壁30多米高处刻上“万仞具瞻”四个大字(A6),表达他自视甚高的气派。

的确,从嘉靖下半叶至万历上半叶,是驻肇庆两广总督及其属下文武官员政绩最辉煌的时期。

但正是从戴耀开始,明朝对澳门的管治开始走下坡路,成为明皇朝由盛转衰的先声。起因是葡人在澳门对华贸易的成功,吸引了西班牙、荷兰、日本等国商船多次到澳门海面要求贸易。戴耀均听任澳葡当局为垄断对华贸易权出动武装对其它国家商船实施抢劫,还听信葡人诬他们是海盗,拱手把对外贸易控制权出让给葡人,还准许他们趁机扩大驻澳武装,使国家主权受到损害。

此后两广总督为朝中东林党争所牵制,驻澳门葡人更得以乘机蚕食中国主权。至天启年间,朝廷鉴于开放澳门为商埠带来不良后果,决定收缩对外贸易,关闭其时新在澎湖列屿一带开设的与荷兰、日本等国互市的口岸。于是荷兰人侵占台湾,福建商人郑芝龙、刘香以海盗的形式继续与外人做生意,并组织台湾人抵抗荷兰侵略。崇祯二年(1629年),福建巡抚熊文灿招降郑芝龙,任郑芝龙为福建游击将军。崇祯五年(1632年),熊文灿升任两广总督驻肇庆。崇祯八年(1635年)四月,熊文灿指挥郑芝龙灭刘香于田尾洋,郑说他在海战中得摩利支天(佛教战神)空中现形相助,熊文灿于是在七星岩水月宫置摩利支天及二侍女大铜像供奉。崇祯十年(1637年)铜像落成,郑芝龙游肇庆,在莲花洞刻有题诗(G16)。明末其子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成为著名的民族英雄。

崇祯十六年(1643年),农民军首领张献忠攻破长沙。在江西巡抚任上辞职归家的著名学者郭都贤流落端州,在七星岩刻下题诗(H5)。中云:“鸟道追僧影,龙宫狎客眠。”透露出明末士大夫回天乏术要避世出家的心态。清兵入关,崇祯帝自杀,弘光、隆武、永历三个南明抗清政权相继在南方建立。七星岩相继有多个刻有这三个年号的石刻。其中弘光年间贺国泰诗(G22),刘裔都题记(M23),反映了大敌当前南明大臣仍然醉生梦死,无所作为。题为“龙飞丙戌”的李霞绮题诗(G12),则反映了南明唐、桂王兄弟相争桂王朱由榔抢先在肇庆登基的史实,诗末句“简点封章闻紫阁,夜深端摘洞中桃”,更折射出南明一些大臣要趁乱世捞一把的卑劣心理。永历三年(1649年)的王思沂题诗(G10),则记录了这一年暹罗(今泰国)王仍向永历帝朝贡的史实。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为割断沿海人民与坚持抗清的郑成功政权的联系,实施海禁,发布了迁界令。强迫沿海居民,内迁五十华里,严禁渔

船、商船出海。主持其事者，首推平南王尚可喜与两广总督李栖凤。顺治十五年（1658年）与十七年（1660年），李栖凤在七星岩有题诗（B13）与题字（A15）。

清初康乾盛世，发掘七星岩与鼎湖景区的历史文化内涵和风景资源再一次得到一批知名学者和官员的关注。今玉屏岩由南门上玉皇殿登山路旁岩壁上，刻有当时著名学者、诗人陈恭尹、梁佩兰、屈大均、吴绮等与岭南观察使韩作栋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聚会于七星岩，共商修订再版《石室志》一事的石刻（N23）。陈恭尹是清初写隶书的名家，该石刻为其所书。屈大均还在该石刻旁的含珠迳刻上“小千尺峡”几个字（N24），吴绮则在璇玑台前左石壁有题诗（G13）。鼎湖庆云寺后山还有《二代祖塔铭》（V2），详细记载了明末清初庆云寺兴起的历史。该塔铭为梁佩兰撰文，陈恭尹书丹。均名家手迹，弥足珍贵。

今七星岩北海碑亭旁有一则面积达 $8.5 \times 3.1\text{m}^2$ 的巨幅石刻，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署理两广总督朱弘祚的题记（A27）。

清朝是在朱弘祚的前任总督吴兴祚时开放海禁的。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诏准开放广州、厦门、宁波、松江（今上海）四大口岸。吴兴祚设粤海关于广州五仙门内，下设包括澳门在内的七总口及69个小口，开放规模比明朝扩大。澳葡当局为继续垄断对华贸易权，声言禁止别国商船进入澳门。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朱弘祚调任广东巡抚，不理睬葡人的无理要求，开始向英、荷等国发给允许在澳门等地贸易的部票。次年，朱弘祚提议，粤海关设于澳门的正税总口应方便西洋各国派员联系来华贸易事宜，每年由广州将军衙门选派旗兵防守。总口开放当日，葡兵气势汹汹闹事，被朱弘祚命中国官兵平息。是年荷兰商船驶近澳门，澳葡当局开炮轰击。朱弘祚会同广东按察使沈志礼，立即召集葡人代表至前山寨加以责问。葡方顽抗，朱弘祚便请准吴兴祚，派水师进逼澳门，葡方只好交出人犯，并欢迎荷兰商船入泊。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秋，吴兴祚因在肇庆私设铸钱局被革职，朱弘祚摄制两广总督府事，该年英国护卫号商船要求进澳门贸易，朱弘祚指挥它进黄埔，英船不听。次年（1690年），他坚持中国对外贸易主权，成功让英船服从指挥入泊黄埔，正式开始了中英之间正常贸易。朱弘祚非常高兴，游七星岩写下巨幅题记。由于其长子朱绂与蒲松龄是好朋友，所以，《聊斋志异》中的《老龙船户》、《外国人》都曾写到朱弘祚在广东任上的事。

接朱弘祚任两广总督者，为石琳。在朱弘祚题记

石刻右侧不远处，有石琳离任时其部下林兆麟等人为歌颂他创办星岩书院刻下的颂德碑（A31）。碑文说他“总制两粤之十有二年，山海宁谧。”

石琳上任之初（1691年），康熙帝为了试探葡人的恭顺态度，决定将澳门地租银从每年500两增至600两。澳葡当局认为区区小额，很快如数缴交，此事给了康熙和石琳极好印象。所以石琳在任期间，康熙帝颁布了多项优待葡人的诏令，包括给葡萄牙特殊关税优惠，朱弘祚设于澳门的关税总口归葡人自行收税“以充番官俸饷”。这不仅出卖了国家主权，而且在同一个国家内对前来贸易的不同国家实施不平等政策，加剧了我国与英法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成为日后礼仪之争的诱因之一。可见石琳促成的对外交往政策虽“山海宁谧”却后患无穷。

清代初期和中期虽对外政策有失误，但对内政策却有效维持了社会的稳定，诗歌创作数量众多是这一时期文学艺术繁荣的写照。七星岩与鼎湖石刻中，以今存庆云寺大堂的梅花诗百首（U7）最长。浙江著名诗人钱载在玉屏岩南路的题诗（N22）颌联“片云欲起近孤杖，万壑齐青拱七星”，被认为最能写出玉屏岩顶景色真趣。黎简题诗（H8）中关于五羊与七星关系的描述，冯敏昌题诗（H2）中关于出米洞的传说，均为我们搜集有关民间传说提供了佐证。清代主张“性灵说”的大诗人袁枚还在鼎湖山庆云寺刻下长诗（V15）。该诗从端州出发写到抵达鼎湖庆云寺整个过程的感受，情景交融，是袁枚诗歌学说的样板。全部石刻中唯一的一首词是仪克中的《齐天乐》（A2），它插入关于双凤名的传说，融神话境、自然境、诗人梦境于一炉，很有特色。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被称为“粤东三子”之一的大诗人黄培芬到肇庆讲学，刻下题诗（N8）。中云：“下界凡尘绝，清都夜色奇。楼居仙可引，蓬阁梦迷离。”点出玉屏岩夜景之美，也透露出作者对时世忧患的迷惘。

道光下半叶，清朝衰落之象已渐显，鸦片战争爆发。道光二十二年（184年）皇帝派满洲人耆英与英人签订卖国的《南京条约》。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皇帝还任耆英为两广总督，与美国大使签订卖国的《中美望厦条约》。该年西江洪水达到最高水位，肇庆堤围尽缺，哀鸿遍野。水灾过后，肇庆知府在石室岩洞口壁高处刻上“道光甲辰，水痕至此，郡守杨需书以志痛。”（A4）。耆英坐火轮至肇察看灾情，一筹莫展，只能祈求佛来保佑，在石室岩莲花洞刻下草书佛经（G7）。

但清廷自作孽，佛保佑不了。咸丰元年（1851年），肇庆文人袁梓贵在天柱岩刻下《天柱岩路记》（Q3），借开掘登岩之路需要整治顽石一事，愤怒地质问清朝统治者：“如今路之弗平众矣，趣治者，治

曰无法。无法哉？无人也。得其人，法其法，天下路不足平。而榛楷争地，豺狐逼人，吾民日蹙于顽确，跬步悉危涂，则谁之咎也？”

清末光绪九年（1883年），福建福州人陈建侯游七星岩，刻下“五岳归来不看山，料应未上七星岩”七言诗碑（G24），对七星岩风景倍加赞赏的同时，也透露了“此日偏歌行路难”的复杂心情。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湖南衡阳人彭玉麟被派到肇庆督师抗击法国入侵越南。次年，清廷在打胜仗的情况下仍下令撤兵与法人议和，彭玉麟在石室大岩刻上“群玉空玲”四个大字（E6），表达中国人空有报国心却受到朝廷阻拦发挥不出的愤懑。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了民国，袁世凯窃国称帝，孙中山号召发起护国运动。民国五年（1916年）5月1日，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在肇庆成立，以岑春煊为都司令，誓师讨袁。5月8日，中华民国护国军务院在肇庆成立，壮大了反袁声势。6月6日，袁世凯死于北京，6月9日，孙中山要求北京政府恢复民元临时约法，尊重国会。次日，驻肇庆护国军务院通电拥护孙中山主张。6月22日，北京段祺瑞致电岑春煊，诬蔑岑赞同孙中山的主张系“以命令变更法律”。6月25日，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宣布加入护国军，宣称民元约法未恢复前，不接受北京海军部命令。是日，孙中山派到肇庆与护国军务院联络的陈肇基与岑春煊部属林安远、著名书法家王铁峰、日本人郡岛今水、东幸治诸先生游七星岩，刻下题记（A18）。6月29日，北京政府被迫宣布遵行民元约法，恢复国会。7月14日，护国军务院撤销。陈肇基、林安远等人的题记石刻，为我们研究民初驻肇庆护国军务院与孙中山的密切关系提供了历史的佐证。

民国六年（1917年）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孙中山相继领导了护法斗争和反对两广军阀的斗争。于屡次挫折后，孙中山在上海得到共产党人的支持，民国十二年（1923年）2月南下设大元帅府于广州。5月，发起驱逐广西军阀的肇庆攻坚战，取得完全胜利。7月下旬，孙中山游鼎湖山，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宋庆龄1980年题写的“孙中山游泳处”石刻（X20），留下对孙中山深切的怀念。

观察和研究星湖石刻，使人如置身肇庆千年历史画廊，不仅领略到肇庆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在岭南以至整个中国政治和军事史上的地位，而且石刻中留下的地名、职官名，还可作为研究历代政区沿革、地方官制演绎、自然环境变迁，提供实物依据。石刻中的古今体诗歌、长短句，连同题榜、对联、歌行、纪游文、叙事文，还有佛教经文等各种文学体裁创造出来的艺术境界，给游客提供了美好的艺术享受，是岭南文学艺术百花园重要的组成部分。

李邕《端州石室记》是他留下的唯一正书碑，历来被认为是我国书法艺术的极品。此外，星湖石刻中，篆、隶、楷、行、草，均有名家精品存世。如包拯（B17）、郭祥正（B11）的行书，朱完（A35），陈恭尹（N23）的隶书，陈恭尹的楷书（V2），黄培芳（C6、N8、N40）、林召棠（N8附）、王铁峰（A18）、梁清平（N5）的行书，耆英的草书（G7），郭沫若的行草（Q1），都是名家真迹。

另外，前人在石室岩璇玑台对壁刻下的洪水标志，可与杨霈在石室岩洞口刻下的“道光甲辰，水痕至此”（A4）相对照，是西江水文重要标记。它和唐代王化清《游石室新记》（C7）留下的“零羊峡”地名一样，是西江历史地理科学研究的珍贵资料。

肇庆星湖石刻精彩之处尚多，本文挂一漏万，不能尽述。相信本书的修订再版，可以吸引更多关心肇庆，潜心研究岭南历史文化和文学艺术的专家学者、热心人士，发掘到更多令人神往，发人深思的历史文化和文学艺术成果，补正笔者的疏漏，为促进肇庆文化名市的建设再创新的辉煌。

李北海記

蕭而一變天時寶乳練於玉顏石牀於仙座
集福庭寄寸寒寸恍子惚子使營魄九昇嗜慾雙
羽翼志若摩雲天秦漢之間莫知代祀靈之上
當是時也慕名者執雌而退伯物者守心而安求
而凝懷書者而默有若邪伯舉公守恭廣孝
觀國政門其業流允歸心介特之安於是
能吏脩其歌一遊以遊莫不解榻於斯張樂於
龍遣土駟馬避暑窟室締賞林壑擊石如鐘
固亦轉丹竈擬紫芝迹叅寥之遠心惟習隱之幽
開元十五年正月廿五日